

※ 文哲所三十週年所慶專輯 ※

近現代文學研究回顧

彭小妍^{*}

二〇〇一年近現代文學研究室成立，次年本所結束長達十四年的籌備處階段，正式成立為中國文哲研究所。迄今十八年來，我們研究室的工作涵蓋院方及本所的研究計畫、院外委託計畫，每年舉辦多次國際學術研討會，其中不乏與國外學術機構合辦者。

其次，為了提攜後進，我們也舉辦過三次博士論文工作坊(2011、2012、2018)；並接受教育部委託及副院長室的補助，為國內研究生舉辦連續五年的文化理論研習營(2007-2011)，獲得學界好評。當年參加我們的工作坊及研習營的博士生、助教及學員，許多已擔任國內外重點大學的教職，展開各自的教學研究生涯。過去在我們研究室培訓的博士候選人及博士後學者，目前也在臺灣及國際學界發光發熱，例如哈佛大學、波德科羅拉多大學、奧勒岡大學、史密斯學院、維也納大學、東京大學、新加坡理工大學、國立中山大學等。

此外，我們也致力於推廣國內基礎人文教育。自二〇一四年以來承院長室及副院長室交辦，我們規劃並主持本院「人文講座」計畫，與陽明大學、臺北醫學大學及國防醫學院合作，邀請人文及社會科學各所的同仁擔任講座，每週四下午在本院為三校生醫科系的學生開設人文及社會科學核心課程。五年來陸續開課的本院同仁已達四十九名，共開設五十五門不同的課程，學生修課人次超過二千三百人。

回顧研究室過去迄今的研究工作，主要包括三方面：1. 從成立之始，我們就致力於臺灣文學文化研究，近年對臺灣電影研究的推廣更是不遺餘力。2. 近現代文學研究室的特色是邀請當代作家及電影導演現身研討會，與觀眾面對面交流；相關研討會及展覽除了學者專家的參與，也吸引大量民眾共襄盛舉，讓中研院的學術殿堂

* 彭小妍，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兼顧菁英與庶民，拉近了學術與民眾的距離。3. 我們於二〇一〇年前後開始關注翻譯與跨文化研究，三度連續進行三年重點計畫，推動相關研究，跨文化成為我們研究室最具有代表性的研究項目，而目前跨文化的概念已在兩岸三地傳播。

（一）臺灣文學及電影研究

二十一世紀前後臺灣文學是新興學科，從研究室成立之前，應國內外學界的強烈期許，我們大力推動臺灣文學研究，例如接受文建會委託，執行「楊逵全集計畫」（1997-2001），並結合國內及日本、歐美研究者，執行「許壽裳書簡集資料彙編計畫」（2003）。我們翻譯並編輯基礎資料，提供國內外研究者使用，《楊逵全集》十四卷（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1998-2001）及《許壽裳書簡集》二卷（文哲所，2010）陸續出版，獲得學界推崇，《楊逵全集》更被學界譽為全集編撰的典範。我們繼而執行本院主題計畫「正典的生成：臺灣文學與世界文學的關係」（2002-2004），於二〇〇四年與法國波爾多第三大學及德國魯爾大學合作，邀請臺灣研究者十人前往波爾多及波鴻參加臺灣文學研討會；我們同時並透過文建會補助，邀請黃春明、楊牧、李昂、朱天文四位作家在巴黎及波鴻，與德法讀者進行圓桌討論，當地民眾迴響熱烈。由於這次合作奠定的基礎，法方的安畢諾 (Angel Pino)、何碧玉 (Isabelle Rabut) 夫婦致力於推廣臺灣文學，成為現當代臺灣文學最著名的法文譯者。他們翻譯的法文版《二十世紀臺灣文學選集》，二〇一九年二月已經出版到第四卷。

在臺灣電影研究方面，應學界的要求，我們於二〇〇八年舉辦研討會“Lust/ Caution: History, Narrative, and Movie Language”，與國內外學者共同探討李安改編自張愛玲的電影《色 / 戒》，並出版論文集 *From Eileen Chang to Ang Lee: Lust/ Caution* (Routledge, 2014)。我們於二〇〇九年舉辦研討會「美學與庶民：2008 臺灣『後新電影』現象」，探討魏德聖《海角七號》的庶民影像與新電影美學的對話。研討會中具有代表性的文章編輯為《電影欣賞學刊·海角七號專輯》（2010年3月）。二〇一五年我們舉辦研討會「傳奇：《聶隱娘》」，二〇一六年獲得科技部補助，舉辦研討會“*The Assassin: Hou Hsiao-hsien's Martial Art Aesthetic*”，探討侯孝賢的電影《刺客聶隱娘》。中文論文集《聶隱娘的前世今生——侯孝賢與他的刺客聶隱娘》（時報文化，2017）、英文論文集 *The Assassin: Hou Hsiao-hsien's World of Tang China* (HKUP, 2019) 相繼出版。後者甫由香港大學出版社推薦，競賽 Society

for Cinema and Media Studies 的最佳論文集編輯獎 (Best Edited Book)，與有榮焉。為臺灣導演的單一影片舉辦研討會及出版論文集，儼然已成為近現代文學研究室的傳統。

電影研究方面，二〇一三年我們也舉辦比較中港臺影像文化的研討會“Altering Archives: The Politics of Memory in Contemporary Sinophone Cinema”，研究對象包括臺灣導演陳建仁、蔡明亮、李安及日據時代臺灣影片的數位化，後出版為論文集 *The Politics of Memory in Sinophone Cinemas and Image Culture: Altering Archives* (Routledge, 2018)。

(二) 作家、導演與讀者觀眾的見面會

近現代文學研究室的研究對象可能是當代知名作家與導演，舉辦研討會及展覽時，往往吸引眾多粉絲參與。二〇〇九年十月我們獲得副院長室補助，與中國社科院合作，邀請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來訪，並舉辦研討會「國際視野中的大江健三郎文學」及展覽，在本所大廳展示其手稿、作品、生活紀實及諾貝爾文學獎的獎章（複製品），並於現場播放其長子大江光創作的音樂。因大江的諾貝爾獎得主光環，不僅學者、民眾熱情參與，大批媒體也競相來所採訪報導。為了活動宣傳，我們事先編輯了《印刻文學生活誌·大江健三郎專輯》（2009年9月），兩年後出版論文集《大江健三郎：從自我到世界》（文哲所，2011），以饗學界。大江事後致贈個人著作數本以示感謝，上有其親筆簽名，我們已轉交給文哲所圖書館珍藏。

二〇一四年九月我們舉辦蔡明亮導演演講暨座談會，邀請國內外學者與蔡導演對談，並放映其影片《無色》、《西遊》。這些影片在電影院中無緣得見，學者們很慶幸能在文哲所的活動中觀賞。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在「傳奇：《聶隱娘》」研討會上，我們邀請導演侯孝賢、編劇朱天文及謝海盟前來演講，並與閱聽人對談，頗受好評。現場活動包括放映電影《刺客聶隱娘》。

二〇一六年六月我們與師範大學表演藝術系合作，在文哲所舉辦「諾貝爾獎得主高行健先生演講暨座談會」，演講題目是〈呼喚文藝復興〉，邀請了國內研究高行健小說及戲劇的學者專家參與。當天觀眾爆滿，五位引言人、觀眾與高先生的互動熱烈，絕無冷場。演講及討論的重點是：在全球化的時代，政治和廣告無孔不入，連文化也充分市場化；文學和藝術如果不退化為一種文化消費，是否可能保持精神的獨立和創作的充分自由？這個論題，歷久彌新；由於今天舉世人文素養普

遍不受重視，更是發聾振聵。事後我們將高先生的演講及座談會的錄音稿整理為文字，編輯後發表為〈呼喚文藝復興——高行健演講暨座談會紀錄〉（《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27 卷第 3 期〔2017 年 9 月〕）。

二〇一六年七月我們獲得張愛玲遺產執行人宋以朗先生支助，與香港浸會大學合作，在文哲所舉辦研討會「不死的靈魂：張愛玲學重探——張愛玲誕辰九十五周年紀念」暨張愛玲文物展，所有手稿、服裝、配件等文物，均由宋先生及皇冠出版社提供。此次展覽特意配合當年的院士會議舉行，盛況空前。後來出版兩本論文集，《千迴萬轉：張愛玲學重探》（聯經，2018）、《色／戒：從張愛玲到李安》（色／戒英文論文集的翻譯；聯經，預計 2020 年出版）。

（三）翻譯與跨文化研究

研究近現代中國文學文化的發展，不能不留意翻譯及跨文化語境所扮演的角色。從早期我們就開始關注翻譯研究在近現代文學文化研究中所扮演的角色。二〇〇五年我們獲得蔣經國基金會補助，與日本愛知縣立大學合作，在該校舉辦研討會“Textual Translation and Cultural Context: China, Japan, and the West Since the Late Ming”。二〇〇六年我們繼續透過蔣基會補助，與巴黎國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及新竹交通大學合作，在巴黎舉辦研討會“China and Its Others: Cultural Medi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in the Modern Era”。以此為基礎，我們於二〇〇六至二〇〇七年結合國內及歐美學者，進行本院先導研究計畫「文本翻譯與文化脈絡：晚明以降的中國、日本與西方」。我們爭取到本院與英國國家學術院 (British Academy) 的支持，與英國曼徹斯特大學建立合作關係，二〇〇八年在該校舉辦研討會“China and Its Others: Knowledge Transfer and Representations of China and the West”。有關翻譯研究的中英文論文集 *China and Its Others: Knowledge Transfer Through Translation, 1829-2010* (Rodopi, 2012)、《文化翻譯與文本脈絡——晚明以降的中國、日本與西方》（文哲所，2013）、*Modern China and the West: Translation and Cultural Mediation* (Brill, 2014) 相繼出版。

近現代文學研究室從二〇〇九年的重點計畫開始，即關注翻譯與華文文學文化發展與歐亞跨文化語境的關係。二〇一二年前後近現代文學研究室及本所比較哲學研究室開始發展跨文化 (transculturality) 概念，成為文哲所最具特色及影響力的研究之一。近現代文學研究室至今已經陸續進行三個相關重點計畫，包括「主體性的

流變：跨文化情境中的華文文學文化」(2012-2014)、「翻譯與跨文化協商：華語文學文化的現代性、認同、性別與創傷」(2015-2017)、「『跨文化的弔詭』與華語文學文化：對二元化及標籤化思考的批判」(2018-2020)。

繼文化研究於一九七〇年代以來引領風騷數十年之後，跨文化概念是近年來國際學界最受矚目的新興研究方法之一，不僅牽涉到文學文化方面的研究，也影響到其他人文學科的方法論，包括哲學、社會學、心理學等。近十餘年來在國際學界勃興的跨文化研究，截至目前為止，似乎是各地不約而同地陸續各自進行，然而在理念上具有內在的聯繫。例如俄裔美國理論家愛普斯坦 (Mikhail Epstein) 從巴赫金 (Mikhail Bakhtin) 的文化學 (culturology) 發展出跨文化的概念，認為跨文化的進路挑戰傳統國家及文化認同概念，衝擊認同政治 (identity politics) 及多元文化 (muticulturalism) 理念，不受意識形態及學科傳統束縛，也就是不受任何「偏見」的束縛。由於他的啟發，以文化研究為名的哲學叢書 *Transcultural Studies: A Series in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於二〇〇五年開始出版，目前仍然持續。此外，一九八六年起，以芝加哥大學及芝加哥心理分析協會為主的 Center for Transcultural Studies，以網路作為平臺，連結全球的研究者進行跨文化研究計畫。歐洲方面，海德堡大學哲學系近年設立了跨文化研究所碩士班。二〇一〇年倫敦的羅漢普敦大學 (University of Roehampton) 的媒體文化系設立了翻譯與跨文化研究中心 (Center for Research in Translation and Transcultural Studies)。在臺灣，二〇一〇年輔仁大學成立了跨文化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of Cross-cultural Studies)，其前身為翻譯研究所、比較文學研究所。次年，政治大學則成立了跨文化研究中心 (Center for Cross-cultural Studies)。然而此二者皆以 cross-cultural studies 為名，在理念上顯然仍以傳統的多元文化概念為基礎。文哲所近現代研究及比較哲學的同仁近年來則系統性地推動 transculturality 的概念，開拓此新興研究方法論，重新思考漢學研究的方法及所謂「中國」的意涵；意圖透過與其他文化的連結，彰顯漢語文化的混雜包容性，推動中國學研究與國際非漢語學界的接軌。

跨文化概念一方面既是對多元文化概念的檢討，也是回應及挑戰傳統比較研究及後殖民研究。傳統的比較研究，強調不同文化的差異及特性，並主張各文化共享的普世價值。相對的，多元文化研究 (multicultural studies) 及間文化研究 (intercultural studies 或 cross-cultural studies) 強調的是差異、認同與溝通。後殖民研究則強調異文化接觸時，知識與權力的關係，批判強勢文化的霸權，指出弱勢文化

的諧擬及抗拒。相對的，跨文化概念的重點不在討論差異、認同與溝通，而是關注各文化的混雜本質、各文化間的相互連結，並體認他者文化的不斷滲透，如何成為自我不可分割的部分，進而促成自我的轉化與創新。換句話說，跨文化概念贊同後殖民研究主張的文化混雜或混血 (hybridity) 說法，但強調的是與他者的融合所帶來的轉化與新生，也就是愛普斯坦所主張的「超越原生文化及轉化文化本身」(to transcend our “given” culture and to apply culture’s transformative forces to culture itself)。在討論權力關係時，跨文化研究關心的並非強勢文化的霸權與弱勢文化的抗拒，而是在權力不均等關係中，弱勢文化如何在全球化趨勢中找到立足點，創新傳統、面向未來。以下進一步說明跨文化作為方法論的意義：

1. 就研究方法而言，我們提出「跨文化現代性」(transcultural modernity) 概念，主張現代性發生的場所是跨文化場域 (transcultural site)，亦即不同語言、文化及國家的重疊空間，打通古今中外，既跨語際、跨國家、跨地域，也跨學科及跨歷史分期 (translingual, transnational, transterritorial, transdisciplinary, transhistorical)。翻譯研究作為方法，也是跨文化研究不可或缺的一環，透過翻譯研究，可展現華文文學文化如何因與他者文學文化的連結——包括語彙、概念、文字與影像文本等的轉譯、互文——而產生自我轉化。我們結合翻譯研究與跨文化概念（以下簡稱跨文化概念），透過全新的視角來檢驗歷久彌新的全球性議題。

2. 打破二元對立及標籤化：跨文化場域也是種種二元對立範疇的重疊空間，例如過去／現代、精英／通俗、國家／區域、男性／女性、文學／非文學、圈內／圈外等等。後殖民研究的二元劃分不可取，因為它將二元兩端的恆久辯證關係簡化了。二元化論述強調霸權與弱勢、中央與邊緣、主要與次要的二元劃分，但如果仔細檢驗，這種絕對的二元劃分是難以成立的。例如，在文化匯聚的場域，弱勢與強勢的關係錯綜複雜，弱勢可以利用強勢求生存，更可以迂迴隱晦地挑戰、撼動強勢霸權。若膠著於此類二元劃分，就漠視了邊緣弱勢突破限制的生命力和主體性，置弱勢的能動性於不顧。從根本來說，權力關係的不平等，是任何社會團體的現實。假如我們要求絕對的平等，那只有在烏托邦才可能，而烏托邦是極權世界。對後結構主義學者，諸如福柯 (Michel Foucault)、霍米·巴巴 (Homi Bhabha) 及茱蒂斯·巴特勒 (Judith Butler) 等而言，個人能動性總是在各種體制錯綜複雜的權力關係中運作；在不均等的位階上，個人能動性才有發揮的可能。權力關係並非單純的宰制與順從。福柯在談論權力關係時，從未倡議「平等」。相對的，他主張以個人的「自

由實踐」(practice of freedom) 來測試體制的界限，藉此開拓創造性轉化的空間。從打破二元劃分的迷思，跨文化進一步挑戰標籤式的思考模式。中國數百年來的演變，正是最好的例證。清朝初期的中國，向西南部與東北部開疆闢土，結果土地倍增成為內陸大帝國，但到了十九世紀末，這個大帝國已經淪為列強瓜分的次殖民地。華語語系理論從後殖民觀點所挑戰的中國帝國，是清朝初期的大帝國，還是強權瓜分下、已經支離破碎的帝國？再看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濟起飛，儼然成為冷戰結束後全球新秩序中足以與美國、歐洲抗衡的三強之一。中國數百年來的戲劇性起伏，正說明了強勢／弱勢、中央／邊緣等的二元劃分，是經不起歷史考驗的。進一步來看，中華人民共和國自一九四九年建國後，雖然始終標榜社會主義，實質上在一九七八年改革開放後，清末民初以來的三大意識形態立場——保守主義、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已逐漸突破壁壘分明的鬥爭狀態。換句話說，在改革開放後，所謂保守主義、自由主義、社會主義的標籤明顯鬆動，固守標籤式的僵化界限無法真正了解當代中國進行中的政經體制。事實上，若爬梳清末民初的相關文獻，會發現五四前後所謂激進派、保守派、自由派的共通性也大於差異性。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微妙共通性，亦應從跨文化角度重新作細密的分疏，探討這些長久以來標籤化的意識形態的弔詭共存。

3. 跨文化的倫理觀與認同問題：全球化是當下現實，目前看來也似乎是不可逆轉的趨勢，如何面對我們的未來？二〇〇七年德里克 (Arif Dirlik) 提出的「全球化現代性」概念，訴諸「人類的能動性」(human agency)，期待憑藉社會意識的傳播，以及由下而上的個人、組織的行動，逐漸改變全球化的不公不義。跨文化概念也是面對全球化的回應。同樣的，我們主張跨文化不僅是研究方法，也是面對異文化的倫理觀，其中的關鍵概念是「流動的主體性」(subjectivity in flux)，一方面批判僵化固定的主體概念，一方面彰顯在他者文化的衝擊滲透之下，自我的不斷流變。就宏觀層面而言，今天各地文化彼此大量流通、密切交錯，國家疆界已非生活方式的疆界；已經沒有所謂純粹的國家文化，文化的本質就是混雜 (hybridization)，文化內部的異質性不見得低於文化外部的異質性。就微觀層面而言，個人的文化養成也是混雜而充滿異質成分的，換句話說，就是跨文化的；探究個人的認同，也就必須探究不同源的異質文化成分如何融合為一體，成就了超越國界或文化疆界的個人認同。我們提出「流動的主體性」概念，主張超越僵化的主體論，堅持國家認同與個人認同（或文化認同）的分野，並進一步理解，文化養成的選擇是個人的基本權

利。就華文文學文化的範疇而言，透過跨文化的視角，所謂「純粹的臺灣人」或「真正的臺灣人」、「純粹的中國人」或「真正的中國人」等等，是可議的。過去數年來我們曾經在歐美、香港、東南亞及臺灣，與各地學者交流討論，往往有學者質疑：流動的主體性是否缺乏主動性或是呈現漂浮的狀態？當然是否定的。流動的主體性是一種倫理態度 (ethic attitude)，強調的是心靈的自由選擇及人的自由實踐。人的一生中，面對無數危機，都必須個人權衡情勢、折衝協商以後，做出個人的自由選擇。唯有接受自我中並存的他者，體認自我的跨文化認同 (transcultural identity) 特質，才能在全球化的世界中與異文化和平並存，並進一步吸納異文化，以異文化作為創新自我的養分。體認了主體與時俱進的本質，才能真正釐清自我與他者相輔相成、相互依存的關係，才能面對全球化導致的問題。

4. 跨文化的弔詭 (paradox)：若說跨文化現代性所強調的流動主體，乃因自由實踐而有實現的可能，那麼，自由實踐如何運作？我們認為，自由實踐運作於「跨文化的弔詭」中。將 paradox 翻譯成弔詭，是牟宗三在解讀《莊子·齊物論》時的主張：「〈齊物論〉說：『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弔詭。』我們就用弔詭這個詞來翻譯西方那個 paradox，很適合。」他認為「分析是第一步，第二步是辯證的」，黑格爾用辯證邏輯，遵從邏輯規律分解地講，是直線的，叫做「思考」；東方哲學則是「曲線的智慧」，乃通過辯證的「詭辭」來表達。牟主張，莊子所講的道理並非「分解的邏輯思考」(logical thinking) 可以達到，而是透過感覺、靈感，通過矛盾辯證的詭辭，化掉相對，進而達到絕對，這才是「真正的辯證法」。牟認為，弔詭不是分解的、思辨的理論，而是實踐的，就個人實踐達致的境界而言。牟宗三所說的弔詭是「個人實踐達致的境界」，似乎與福柯所說的「自由實踐」相通，值得深究。跨文化的弔詭，說明了在全球化國家、語言、文化等疆界的模糊與族群流動的時代，文化屹立不搖與變異並存的矛盾，傳統與創新的共生與翻轉，理性與唯情的反覆辯證。這是近現代文學研究室將持續探討的議題。

近十年來，翻譯與跨文化研究是我們研究工作的重點。我們曾在俄國聖彼得堡，與聖彼得堡大學亞非所東方系合辦第三屆俄羅斯國際遠東文學文化會議 “Issues of Far Eastern Literatures”，參與「中國現代文藝思潮：二十與二十一世紀中國文學發展的道路與前景」的場次 (2008)；我們獲得科技部補助，與 Association of Chinese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在本所合辦 ACCL 年會 “Global

Sinophonia” (2012)；舉辦以詩為研究專題的一系列研討會 (2007、2009、2013、2017)；與香港中文大學長期合作左翼文學及跨文化會議 (2012、2013、2014、2018)；邀請臺灣及歐美的翻譯研究社群學者，參加翻譯與跨文化研討會 (2007、2011、2012、2013、2015)。迄今我們的共同研究已由文哲所出版下列論文集：《跨文化情境：差異與動態融合——臺灣現當代文學文化研究》(2013)、《跨文化實踐：現代華文文學文化》(2013)、《翻譯與跨文化流動：知識建構、文本與文體的傳播》(2015)、《跨文化流動的弔詭：晚清到民國》(2016)。近現代文學研究室未來承先啟後的發展值得期待。

